

摘要

两难选择的价值和规范基础

——对“不可公度性”的规范性分析

价值比较理论的“不可公度性”概念对多元价值比较提出了评估性和规范性难题。多元价值比较涉及各价值项之间缺乏共同衡量尺度的困难，即不可公度。学者们对于不可公度者是否可比较持有不同意见。否定者或是否认存在公度标准，或是否认存在正面表述不可公度关系的方法。肯定者认为不可公度者可比较，能够用三分价值关系之外的第四种“均势”关系来说明和解释。均势关系不是对传统三分价值关系“更好”、“更坏”、“同样好”的否定，而是正面补充。

价值的不可公度性问题应当通过规范性分析的方法得到解释说明。真正的不可公度者所指涉的是覆盖价值和选择考虑内在包含了多个定量或定性尺度的情形。要实现多层价值项的比较，须将重点从对价值对象的评估转换到行动者合理性行动的证成。拉兹的积极行动主义解释通过主体行动理论的建构避免了正面肯定不可公度者的可比性而无法具体说明的困难。张美露的差异区间模型做出了统一解释全部四种价值关系的尝试，但未能分析均势关系的规范性条件是否应当区别于三分价值关系的规范性条件。拉兹和格尔特的论证指出区分使用两种规范性条件“要求”和“可接受”的必要性；前者作为一种“强规范”适用于确定的三分价值关系，后者作为一种“弱规范”适用于特殊的不可公度关系。拉宾诺维奇提供的可接受偏好排序交集模型具有更好的兼容性和融贯性。通过优化均势关系的解释模型，能够有效应对可传递性问题带来的冲击，可传递论证对均势关系并不构成有效反驳。

关键词：

不可公度性；三分价值关系；均势；偏好态度；可传递性

Abstract

The Evaluative and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Choice-Making in Dilemma

A Normative Analysis of "Incommensurability"

The notion of "Incommensurability" in the theory of value comparison has opposed much difficulty to the plurality of values. The comparison of plural values seems difficult in the absence of common evaluative scale, namely incommensurable. Scholars argue for the possibility of comparing the incommensurables. The incommensurables can be compared, but in the method of assuming the existence of a fourth value relation "parity", other than the trichotomy of value relations. Parity is not a neg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richotomy relations of "betterness", "worseness", "equal-goodness", but a positive supplement. The problem of value incommensurability can be solved by a normative analysis.

The real problem of incommensurability refers to the situations where the covering value or choice consideration involves multiple ordinal or cardinal comparative scales. In order to compare items with multiple aspects of values, the analysis has to be shifted from the evaluation of valuable objects to the justification of rational choice of the agent. The theory of positive action of Joseph Raz illustrates how to avoid the difficulty of confirming the possibility of parity while failing to specify the exact formulation of parity. Ruth Chang offered the model of the intervals of evaluative difference of value comparison, which intended to unify the normative justification of all four relations, but failed to differentiate the parity from the trichotomy thesis. Joshua Gert agrees with Raz in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wo normative conditions: required and permitted. That what is required is a "strong" normative condition compared to the "weak" condition of what is permitted. The former applies to the determinate comparison of trichotomy relations, and the latter can be applied to the incommensurables. Wlodek Rabinowicz proposed the model of the intersections of

permissible preference orderings in comparison of all four value relations. This model is relatively more compatible and coherent than others. These efforts of rationally define parity can respond to the argument of transitivity, which shall not be regarded as a real threat to the relation of parity.

Key Words:

Incommensurability, Trichotomy Value Relations, Parity, Preference, Transitivity

目 录

导言.....	1
一、问题缘起.....	1
二、研究现状.....	3
三、文章主要结构.....	6
第 1 章 不可公度性与三分价值关系.....	11
1.1 多元价值和不可公度问题.....	11
1.2 公度和共同价值量表.....	12
1.3 复杂比较和公度.....	14
1.3.1 有公度的简单比较.....	15
1.3.1 无公度的复杂比较.....	16
1.4 均势关系的合理化.....	18
1.4.1 模糊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的解释.....	18
1.4.2 拉兹对行动合理性的辨析.....	19
第 2 章 价值关系的偏好态度分析.....	22
2.1 均势关系的形式化定义——张美露的评估分差模型.....	22
2.2 适当态度分析——格尔特的偏好区间模型.....	24
2.3 兼容性与融贯性——拉宾诺维奇和可接受偏好排序模型.....	28
第 3 章 四分价值关系的可传递问题.....	32
3.1 反驳不可传递性论证.....	32
3.1.1 不可传递性的挑战.....	33
3.1.2 痛苦连续体论证.....	34

3.1.3 复杂比较的困难	35
3.2 全盘考虑和相对比较	37
3.2.1 价值图谱假说	37
3.2.2 有限定的比较情境	39
3.3 连续体论证和麦堆悖论的疑难	40
3.3.1 微小提升的连续体	40
3.3.2 对麦堆悖论的回应	41
结 语	43
参考文献	45
作者简介	48
致 谢	49

导论

一、问题缘起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价值理论中“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这一价值关系的规范性问题。“价值理论”(Value Theory)这一术语在哲学讨论中可以有或宽或窄的不同解读。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凡是涉及到“评价性”(Evaluative)的概念或命题的理论领域都可以视为价值理论的讨论对象,如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美学、宗教学等等。最狭义的价值理论则是道德哲学中规范伦理学的一个论题,涉及对诸种事项的价值进行断定和比较,包括但不限于功利主义善好(good)的讨论。本文关注的价值不可公度性问题以及所引用诸学者文献的主要论域,是在最宽和最窄的意义之间,对两个或多个事项之间的价值(value)或善(goodness)的关系进行的一种可能的规范化分析和理论化研究。这主要是涉及规范伦理学的一些当代进展,同时也涉及一些对元伦理学的重要讨论。

本文所关注的价值关系是两个或多个价值承载者之间所具有的比较关系,一般被认为可以简单三分为“更好”(betterness)、“更坏”(worseness)、“同样好”(equal goodness)。这里的价值比较考虑的不是什么东西具有客观抑或主观价值,而是有价值的东西之间如何比较和选择的问题。价值是否为某个东西自身具有的属性,与本文的讨论并不相关。对于两个东西或行动的比较,依据的是共同衡量尺度下的价值评估。任意两项A和B,它们的价值关系可以简单形式化为: $A > B$, 或 $A < B$, 或 $A = B$ 。

基于这组三分价值关系,行动者面对可供选择的诸价值项进行合理性的(rational)考虑和选择时,相应地有三种规范性约束:(1)如 $A > B$,则应当选择A而非B;(2)如果 $A < B$,则应当选择B而非A;(3)如果 $A = B$,则选择A和B是同样应当的。针对这一传统的三分价值关系和三分规范性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产生了许多争论。例如,在元伦理学的框架下,价值关系与规范关系之间如何定义?摩尔主义的立场认为应当通过价值语言解释规范语言;但当代价值哲学的主要路径是用规范语言解释价值语言,这也是本文采取的理论路

径。又如，在规范伦理学的讨论中，应当用何种规范语言来描述对两个价值项的倾向性态度(pro-attitude)? 学者提出的相应方案有：“有理由”(have reasons to)、“要求”(required to)、“应当”(ought to)、“可接受”(permissible to)等等。

在这一背景下，价值关系的“不可公度性”是对传统三分理论的一个重要挑战。它是对生活世界中两难困境(dilemma)的哲学化反思，从无关痛痒的选择吃苹果还是橘子、选择听莫扎特的音乐还是欣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到影响深远的选择理科还是文科、选择这所大学还是另一所、选择成为一名律师还是哲学家，以及公共领域的政府决策：财政转移的方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接受难民与否等等。这些两难选择的存在，让我们不能直接放弃比较的可能性，但该如何合理解释和规范这种特殊的比较关系，就成了问题。

价值关系中的不可公度现象，可以简单分为三类情形：(1) 比较项有价值但没有共同衡量尺度，故不可比较。例如笔和杯子不可比，两者功能不同。(2) 比较项没有价值无法参与价值比较，也可以称为“非可比”(即与比较关系无涉)。例如，一个数学符号“7”和一颗鸡蛋不可比，因为符号没有价值；音调“do”和化学元素“te”不可比，二者都没有内在价值。但是，这两种情形中，没有价值的东西固然不可以参与比较，但一般地没有共同尺度衡量的东西，在特定情境下可以付诸比较。例如，虽然一般而言，死亡方式没有好坏之分，但在一个提倡保全尸体的社会中，缢死要好于溺死。因为缢死相比溺死更能避免尸体受到破坏。(3) 只有负面价值或包含负面价值，是不可比的。例如，著名的“电车难题”中，一项选择是杀一人而救五人，另一项选择是杀五人而救一人。此二者不可比，因为两项复合了负面价值(致人死亡)和正面价值(救人性命)。虽然救五人好于救一人，但只要有负面价值存在，价值尺度就是复杂的，对两项选择进行简单的比较就是不可能的。

类似电车难题的第三类困难情形，是不可公度性难题的真正表现形式——复合的多元价值造成了共同衡量尺度缺失。这提示我们，两个价值项在“更好”、“更坏”、“同样好”之外似乎存在着第四种特殊关系，“均势”(Parity)。“均势”具有如下特点：(1) 它既不是一个比另一个更好，也不是两者同样好；(2) 两者不可公度，但并非“不可比”；(3) 它的存在，不是让行动者在两个选择之间如“布里丹之驴”般茫然失措，而必须得出合理的比较结论；(4) 它的合理比较结

论应当有不同于三分价值关系的规范性意义。但应该如何澄清这一概念呢？

具体来说，本文将以三个问题切入：（1）不可公度性这一概念在当代伦理学者的讨论中被如何使用？（2）其在传统三分价值关系之外是否能够通过均势概念得到规范化分析和表达？以及（3）这种可能的规范化分析面临何种理论困难或实践困难？本文拟指出不可公度的价值关系可以在“可接受偏好”（permissible preferences）的规范性条件下得到分析，指出拉里·特姆金（Larry S. Temkin）的可传递性论证对这种价值关系理论的攻击，并提出一种可能的辩护。通过这些论证，本文希望澄清在传统的三分价值关系之外的“均势”关系所具有的在合理性行动层面的实践意义。

二、研究现状

2.1 国内研究现状

价值的不可公度性问题研究在国内尚未得到充分开展。纵观上世纪后半叶至本世纪初，国内学者对于“不可公度性”（或“无公度性”、“不可通约性”，即 Incommensurability）的讨论更多地是从较为宏观的意义系统层面谈论科学、文化、道德的不同体系之间互相冲突、无法兼容的现象。文化层面，在上个世纪的冷战背景下，国内学者们发现哲学不可避免地转向对生活世界的追问，相继表达了对世界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冲突的担忧，深刻体现了我国学者对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和发展前景的人文关怀^[1]。科学层面，这是目前国内学者讨论不可公度性的主要哲学领域。学者们受到库恩关于科学研究范式的不可公度论断的影响，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哲学层面展开对不可公度性的研究和分析^[2]。道德层面，国内学者逐步展开了对麦金太尔、安斯库姆等反对传统道德哲学的批判理论的研究，认为传统道德理论导致了当下诸种道德分歧无法在可公度、可相容的道德前提下得到解决，表现为充满道德困境的价值多元主义^[3]。值得注意的是，陈真在《论道德和精明

[1] 关于生活世界、文化系统、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理解的困难和寻找共同锚点的追求，可参阅高清海，孙利天.论 20 世纪西方哲学变革的主题与当代中国哲学的走向——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J].江海学刊,1994(01):97-104；张汝伦.生活世界与文化间理解之可能性[J].读书,1996(10):71-78；曲晓溪.试论不可通约性的文化意义[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03):32-34。

[2] 关于科学研究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以及对科学解释的合理性的追求，可参阅兰征.不可通约性和可比较性[J].哲学研究,1987(01):30-39；王善博.解释与不可通约性——库恩与罗蒂之间的几点异同[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09):23-25；万丹.库恩的“不可通约性”与世界——谈库恩哲学的前后分期问题[J].哲学动态,2009(11):55-61；展翼文.“解释需要”：一种基于理由的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37(11):28-34。

[3] 参阅李义天.麦金太尔何以断言启蒙道德筹划是失败的？——兼论道德哲学中的“一”与“多”[J].伦理学研究,2007(05):98-103；李义天.美德伦理学会陷入相对主义吗？[J].伦理学与公共事务,2008,2(00):227-244；赵静波.共同价值何以可能——从多元论的逻辑悖论切入[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理性的不可通约性》一文中，提到了张美露（Ruth Chang）等学者对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讨论，简要地介绍了不可通约性概念的部分内涵，但其关注点和侧重点在于讨论道德和精明理性（Prudential Rationality）^[1]的关系，并未涉及价值关系的规范性理论。

国内学者对“*Incommensurability*”概念有不同的翻译倾向，或译为“不可通约性”、“不可公度性”、“无公度性”。在科学哲学的讨论中，学者更多采用“不可通约性”这一翻译；在道德哲学的讨论中，学者更多采用“不可公度性”或“无公度性”这一翻译。总起来看，“不可通约性”字面上更侧重诸项之间化约比较的层面，“不可公度性”字面上更侧重诸项之间共同尺度的层面。本文在技术层面对两种翻译没有倾向，因为无论是“通约”还是“公度”都能够比较准确地指示出这一概念的重要内涵，即多个事项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价值尺度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和评估。本文为行文便利，权且使用“不可公度性”来统一描述国内外研究中对“*Incommensurability*”和部分“*Incomparability*”的讨论。

2.2 国外研究现状

“不可公度性”的理论争议由来已久，但其形式化、规范化讨论的近期起点，可以认为开始于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自由的道德》。拉兹认为普遍存在着“不可比（不可公度）”的现象，如果两项既非一个比另一个更好，亦非同样好，那它们就不可公度或不可比。张美露（Ruth Chang）指出应当区分不可比性和不可公度性：（1）不可比性意味着在正面的价值比较关系中不存在；（2）不可公度性意为无法在一个共同的价值量表中得到精确的度量比较。关于不可公度性的这个基础含义，学者们都有共识，但分歧点在于“不可公度者是否具有正面价值比较关系”以及“如何在不可公度者之间做出合理选择”。不可公度性问题，构成了所有支持价值可比较性和行动规范性的伦理学理论必须解决的难点。分歧之下的不同答案，造成各个学者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不可公度性”的内涵，说法之间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张美露用价值“均势”（parity）来解释不可公度关系。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则先是将其表述为“大致相等”（roughly equal），

版),2017,23(02):14-20; 陈真.麦金太尔的“启蒙计划”批判之批判[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5-15.

[1] 徐向东将这一概念译为“审慎合理性”，本文不做讨论。详见徐向东，《理性慎思与实践融贯性》，第122页；陈真.论道德和精明理性的不可通约性[J].求是学刊,2004(01):5-11.

后又表述为三种“不精确”关系——不精确更好 (imprecisely better)、不精确更坏 (imprecisely worse)、不精确相等 (imprecisely equal), 这三组不可公度的不精确关系, 对应精确的更好、更坏、同样好。谢利·卡根 (Shelly Kagan) 的表述为“同一级别” (the same league), 并且他认为第四种关系“同一级别”事实上可以与其他三种关系兼容, 即“同一级别”的两项可以有一项比另一项稍微好一点或差一点。

不可公度性问题的另一层面涉及到行动者对判断和选择的合理化问题。拉兹虽然持有某种不可比主义立场, 但认为价值比较提供了正当化行动者判断和行动的理由 (reasons)。张美露也相应地持有理由主义立场并且认为第四种均势关系可以被合理化。约书亚·格尔特 (Joshua Gert) 基于价值哲学中规范性立场, 提出了对价值关系的“适当态度分析” (the fitting-attitude analysis), 通过规范性的语言解释价值关系。格尔特指出必须区分两种规范性条件: “要求” (requirement) 和“可接受” (或“许可”, permissible)。前者作为一种“强规范”适用于确定的三分价值关系, 后者作为一种“弱规范”适用于特殊的不可公度关系。沃洛代克·拉宾诺维奇 (Wlodek Rabinowicz) 认同格尔特的强弱规范区分, 并指出“不可比性”在这一分析路径中的恰当位置。针对格尔特的可接受偏好强度区间的价值模型 (intervals of permissible preference strengths), 拉宾诺维奇指出它在解释“均势 (不可公度)”和“相等”关系时的理论缺陷, 并提供了一个新的可接受偏好排序交集模型 (intersections of permissible preference orderings)。

拉宾诺维奇所提出的对价值关系的规范性解释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包容度。通过这一解释路径, 我们能够在有限项的偏好排序图型中发现对于原本不可公度的两项的排序关系, 进而得出面对两难选项的一种弱的可接受的规范性约束。但是拉宾诺维奇的这一模型, 包括所有试图对不可公度性关系做出分析的理论尝试, 都面临着来自拉里·特姆金的“可传递性论证”的严峻挑战。特姆金认为可传递性概念要求各比较项在同一的线性数值范围中有确定的刻度, 通过刻度之间的关系反映比较项之间的关系。而不可公度关系, 甚至包括一般的价值比较关系的可传递性都是成问题的。因为“更高”“更重”这些简单关系可以在统一尺度下衡量, 但无论是均势, 还是更好、更坏、同样好, 它们都是复杂关系。复杂关系的比较涉及多重衡量尺度, 往往是多个简单关系的总和。尺度的不精确导

致总体上确立更好、更好、同样好、均势关系是不可能的。

三、文章主要结构

论文的第1章将说明“不可公度性”这一概念在价值关系和规范性的讨论中被如何使用，它与不可比性的关系。

“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似乎很容易与“不可比性”（Incomparability）混淆。在早期的研究中，这两者被当作可以互相替换使用的相同概念。研究价值理论和行动理论的规范性问题的学者们后来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必须严格区分定义两者，用以清晰指示价值关系的特殊层面。从词源上分析，一方面，“comparable”的拉丁词源是“conparābilis”，来自词干“comparō”和形容词后缀“-bilis”，其中“compār”，意为相似、相符合或相等。故而“comparable”在讨论中应当被理解为广泛的“可以互相比较的”或“相似的”。另一方面，“commensurable”的拉丁词源为“commēnsūrābilis”，来自前缀“con-”、词干“mēnsūrō”、形容词后缀“-bilis”，意为“有共同的尺度”。往往在数学中，译作可通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可被同一数除。故而在讨论中应当将其理解为“能够通过某一特定的共同尺度进行衡量”。

在术语使用上，张美露将“不可公度性”定义为缺少一个共同的价值量表来准确描述和比较各项，而不可比性则是诸价值项之间缺少某一覆盖价值（covering value）或选择考虑（choice consideration）来容纳各项的积极价值关系的比较^[1]。这与拉兹为代表的不可比主义者的观点有所出入。对于不可比主义者来说，固然不可公度性意味着缺少共同的价值量表，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可公度者丧失了可比性。拉兹认为无论是缺少共同的价值量表还是什么别的情况，不可公度者总是不可比的，只有确定的价值量表才能带来确定的比较^[2]。与之相反，肯定不可公度者可比性的主张主要从两种方式去论证：其一是不可公度者的比较单独构成一个特殊的价值比较关系，如张美露用“均势”概念来表述这第四种价值比较关系；其二是不可公度者的比较可以放到三分价值关系中得到澄清，例如，模糊主义者认为不可公度者的比较是模糊的，但必定属于三分价值关系中的一种，而格尔特则认为不可公度者的比较可以确定地归类于三分关系。

[1] 参见 Chang, Ruth. *Making Comparisons Cou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The Possibility of Parity." *Ethics* 112, no. 4 (2002).

[2] 参见 Raz, Joseph.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Clarendon, 1986.

不可公度性的内涵需要一个补充解释,以理清一般实践情形中可公度的两种方式:基数量表比较和序数量表比较。一些被认定为不可公度的事项仍然可以一般地在三分价值关系中比较。这些可以在三分价值关系中得到说明的比较,我称之为简单比较。因为它们要么是可以通过定量测算各个价值承载者所具有的绩点(merit),要么是可以定性排序各个价值承载者所具有的权重,判断各比较项在统一价值尺度上的位置关系。澄清了简单比较的情形,我们可以限制不可公度问题真正能触及的复杂比较情形了。相对应地,不能简单三分比较的,我称之为复杂比较。复杂比较的复杂性体现在所参照的覆盖价值(即所要付诸比较的那个价值)和选择考虑(即与选择情境紧密相关的考虑内容)涉及到多个价值要素或考虑要素,并且诸要素之间的比较难以被简单综合。这才是真正困难的比较情境。解决复杂比较的困难,需要我们把比较的重点从对价值对象的评估转到恰当理解行动者合理化行动的证成上来。拉兹的积极行动主义解释通过主体行动理论的建构避免了模糊主义者想要正面肯定不可公度者的可比性而无法具体说明的困难。行动合理性的证成只需要证成行动的适格性(eligible),而不一定需要严格的应当(ought)。从拉兹的这个判断出发,我们可以为均势关系找到一个恰当的规范性解释。

论文的第2章将系统说明不可公度性的规范化分析和表达的几种尝试。

张美露开启了对第四种价值关系的规范化理论研究,试图用一种统一的差异区间模型容纳全部四种价值关系——更好、更坏、同样好、均势。她将均势关系形式化为:对于两个东西的价值, x 和 y , 并非 x 好于 y 或 y 好于 x (neither is better tout court), 并且 x 不等于 y 。但是,对照拉兹的判断,张美露在规范性语言的选择上,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条件语句强度的重要性,始终用“正当化”(justified)的语言表述全部四种价值关系之下价值承载者对行动者的约束力。

拉兹虽然坚持不可比现象的普遍存在,但认为不可比是可理解的、可分析的。拉兹从行动理论和能动性的角度分析,区分了两种规范力:要求(required)和适格(eligible):比较项之间的优劣相等关系作为行动者采取选择的理由,这个理由应当理解为一种较弱的适格,而非要求。价值比较所能给出的是后一种较弱的规范,借此拉兹至少给张美露的理由主义提供了一种弱的理由主义的解释。

格尔特则提出了新的解释路径,比拉兹的更进一步。他不是全盘采用弱的规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56010011230010054>